

左右為難： 遭人曲解的傅東華研究

張思婷

傅東華是1930年代活躍於大陸的左傾文人，譯作等身，譯風不拘，文類多變。1949年之後，傅氏因曾經翻譯美國普立茲得獎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而遭大陸官方劃右，指責傅氏有意散布資產主義思想，翻譯生涯因此受阻，1980年代方獲平反。與此同時，傅氏譯作在臺廣為流傳，包括《飄》、《詩學》(*Ars Poetica*)、《奧德賽》(*The Odyssey*)、《伊利亞德》(*The Iliad*)、《失樂園》(*Paradise Lost*)、《吉訶德先生傳》(*Don Quixote*)、《猩紅文》(*The Scarlet Letter*)……等，共計17種，多為本地主流譯本，對臺灣譯壇貢獻不容小覷。唯因政治因素所囿，其譯作多匿名或以假名在臺出版，譯者身分遭到隱匿，致使後續研究受阻，兩岸學界對其譯作的批評又不乏偏頗之論。援此，本研究從第一手史料著手，疏理傅氏生平譯作及其在臺流通情況，並從譯者出身、譯者養成、譯者地位切入，勾勒傅氏翻譯生涯的歷史脈絡，分析譯者出身與譯作選擇、譯者養成與翻譯策略、譯者地位與翻譯論戰之間的關係，據此為兩次影響傅氏翻譯生涯甚鉅的翻譯批評提出新的解讀。

關鍵詞：翻譯史、傅東華、譯者研究

收件：2014年1月3日；修改：2014年4月24日；接受：2014年7月3日

On the Distortions in Studies of Fu Tung-hua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aphne Szu-ting Chang

Fu Tung-hua was an active left-wing literary figure and prolific translator in 1930s China, one who translated a range of literary genres using variou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fter 1949, however, Mr. Fu was blamed for disseminating the ideology of capitalism in mainland China with hi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ulitzer-winning novel *Gone with the Wind*. Thus his translation career was hindered, and his reputation was not restored until the 1980s. In the meantime, seventeen of Fu's translations continued to be reprinted in Taiwan, including *Ars Poetica*, *The Odyssey*, *The Iliad*, *Paradise Lost*, *Don Quixote*, *The Scarlet Letter* and *Gone with the Wind*, most of which were mainstream editions. Though Fu'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s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world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his name was and is not widely known because his works were published anonymously or under false names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is phenomenon has eclipsed his identity as a translator and obstructed research, while the most influential analyses of his translations tend to be mark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political bias. Noting these limitations on, and distortions of, interpretations of Mr. Fu's work as a translator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reconstruct his image through solid archeological research, and to discuss his translation care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background, training and status. Its goal is to analyz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u's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works he chose to translate, between his training and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between his status and the criticisms of his transl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analysis can shed new light on two criticisms in particular, the ones that most seriously damaged Mr. Fu's career.

Keywords: translation history, Fu Tung-hua, translator studies

Received: January 3, 2014; Revised: April 24, 2014; Accepted: July 3, 2014

壹、導言

傅東華¹（1893-1971）是1930年代活躍於大陸的左傾文人，生前譯作等身，譯風不拘，文類跨小說、詩歌、戲劇、文學理論，孫致禮（1996）稱之為「綜合型翻譯家」（頁165），韓迪厚（1969）認為「五四以後三十年的英漢譯作，以傅氏最多，介紹西洋文學理論，是傅氏一大貢獻。」（頁99），其名譯《飄》(*Gone with the Wind*)譯筆精鍊、行文流利，讓「郝思嘉」和「白瑞德」的故事傳頌至今；2004年，誠品、聯經、聯副、公共電視合辦「最愛100小說大選」，《飄》排名第70，鄭樹森（2004）於聯合副刊發文表示：「《飄》多虧傅東華的譯筆，在臺灣風光了半個世紀。」

傅氏1971年病逝於上海，終生未曾踏上寶島，譯作卻在臺灣廣為流傳，除了《飄》之外，還包括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詩學》(*Ars Poetica*)、荷馬(Homer)《奧德賽》(*The Odyssey*)和《伊利亞德》(*The Iliad*)、密爾頓 (John 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吉訶德先生傳》(*Don Quixote*)、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猩紅文》(*The Scarlet Letter*)……等，共計17種。然而，由於政治因素所囿，臺灣出版傅氏譯作時，大多未署名，或署以「傅均」、「顧隱」等假名。以《飄》為例，在臺灣出版的39種全譯本中，37種為傅譯本，²其中署名「傅東華」者僅3種，隱匿譯者身分者34種。由於身分遭到隱匿，縱使《飄》是家喻戶曉的名譯，譯者研究卻盡付闕如、難以展開。

譯者姓名隱匿及譯者研究匱乏，已經對翻譯研究和英美文學研究帶

¹ 傅東華本姓黃，傅是岳家的姓，故又名傅則黃，此外尚有凍蘊、伍實、黃藥齋等筆名。

² 另外兩種《飄》全譯本，分別是陳良廷等九人合譯本，以及賈文浩、賈文淵、賈令儀三人合譯本；兩種譯文皆難脫傅譯本的形跡。其餘傅氏譯作在臺流通情況，請參考附錄「臺灣流通的傅東華譯作一覽表」。

來問題。賴慈芸、張思婷（2011）〈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畫〉便已指出譯者姓名隱匿對翻譯研究造成的困擾。此外，在缺乏譯者研究的情況下，縱使譯者姓名未遭隱匿，亦會導致研究障礙。林玉珍（2009）在論述臺灣喬伊斯 (James Joyce) 研究時，以傅氏翻譯的〈複本〉 (Counterparts) 為例，說明譯者素質不佳恐會誤導讀者。林玉珍批評傅氏「誤解當時西方學術界對喬氏的詮釋」，駁斥傅氏於〈譯後記〉表示喬氏譯作在國內仍屬罕見，認為傅氏「沒注意到他的譯本或許並非國內首見」，此語恐落時代錯誤。首先，〈複本〉是傅氏1934年譯作，刊於《文學》第2卷第3號，1936年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短篇翻譯小說集《化外人》。1949年後，《化外人》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發行，林玉珍引用臺灣商務1967年的版本，故而將1967年誤認成該書初版年，因此論斷早在傅譯之前，白先勇等人已於《現代文學》刊載《都柏林人》 (Dubliners) 的單篇譯作；再者，林玉珍批評傅氏「誤解當時西方學術界對喬氏的詮釋」，此「當時」亦非彼「當時」。因此，傅譯〈複本〉的價值，應當重新評估。

對於傅氏譯作的偏頗之論不僅於此。1950年代，大陸反美意識型態盛行，學界對《飄》出現反動。1958年北京大學西語系編著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第四編〈1937-1949.09的翻譯文學〉第四章〈兩個批判〉第二節即〈傅東華譯《飄》的批判〉，文中抨擊《飄》的種族歧視和資產階級人生觀，³ 批評傅氏的翻譯和序言「宣揚了他的反動的文藝觀點和翻譯觀點。表明傅東華的立場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的，是自覺地利用這部書來散布毒素的。」⁴ 文革期間，傅氏在出版系統勞服為上級斥為「壞蛋」，也與他翻譯《飄》有關（金性堯，2008，頁134），1971年則因其「反動」思想死於文革批鬥（徐鑄成，2009，頁

³ 關於大陸學界對《飄》的反動，參閱張家平（1995）。

⁴ 《中國翻譯文學簡史》並未正式出版，筆者尚無緣窺其批判內容，此處係轉引自吳慧敏（2007）。

298-302)。

針對北京大學學生批判傅譯《飄》，謝天振（2002，頁177-181）認為這是大躍進時代的產物，批判內容有失公允。至於為何失之公允，謝氏並未提供具體例證。事實上，傅氏1936年於《新中華》介紹譯作《真妮姑娘》(*Jennie Gerhardt*)時，即已抨擊資本主義：「我們在這裡面可以明白看見『個人主義』如何跟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支配了一切；可以明白看見一切家庭的關係、男女的關係，都如何受了資本主義的鍛鍊而成為冷酷無情的『生意經』。」（頁87）因此，對於傅氏自覺利用《飄》來散布資本主義的毒素一說，值得商榷。

除了《飄》之外，傅氏早年翻譯的《失樂園》⁵也曾引來筆伐。1933年，梁實秋與傅東華為了《失樂園》的翻譯展開論戰。梁氏針對傅譯的詩體和用字加以針砭，指出「密爾頓是有意的要去掉韻，這是極明了的一件事實……而傅先生的譯文，偏偏的有韻。」（梁實秋，1933a，頁36）至於遣詞用字方面，文中舉出九處誤譯，「略舉幾項，以見一斑」（梁實秋，1933a，頁41）。對於梁氏的批評，傅氏隨即登文回應，說明譯文用韻的緣由，並針對梁氏的糾謬逐一辯駁，認為確為誤譯者僅一項。1949年後，梁氏對傅譯《失樂園》的批評論調在臺繁衍流傳。1968年4月，《純文學》刊載陳祖文⁶〈英詩中譯一何以要忠實於原作的結構〉（1971，頁33），批評傅譯《失樂園》不該用韻，認為「傅氏完全不顧作者的詩體，如何能夠表達作者的原意？」論點與梁氏幾乎如出一轍。此文於1971年收錄進陳氏《譯詩的理論與實踐》，1974年收進梁實秋編纂的《翻譯創作文典》。2002年九歌出版的《雅舍談書》，亦收入梁氏當年對傅譯的批評。至於傅氏當年對梁氏的辯駁，如

⁵ 《失樂園》全書12卷，1930年傅譯前8卷，唯7、8卷付諸一二八砲火，僅前6卷於《萬有文庫》連載並出版單行本。

⁶ 陳祖文是梁實秋在北京大學外文系任教時的學生，來臺後曾與梁氏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任教。

今在臺幾已無人知曉。

1930年代梁實秋對傅譯《失樂園》的批評，以及1950年代大陸對傅譯《飄》的批判，是影響傅氏翻譯生涯甚鉅的兩大譯論，前者改變傅氏的詩歌翻譯策略，後者中斷傅氏的翻譯生涯。兩篇譯評中，《失樂園》由右派文人發難，《飄》則遭左派知識分子攻訐，傅氏處境可謂左右為難，時至今日仍未獲昭雪。爰此，本研究從第一手史料著手，疏理傅氏生平譯作及其在臺流通情況，藉以解決譯者身分不彰導致的研究困難，並從譯者出身、譯者養成、譯者地位切入，重建傅氏翻譯生涯的歷史脈絡，解釋傅氏對於譯作及翻譯策略的選擇，進而對上述兩大譯論提出新的解讀。

貳、譯者出身與譯作選擇

傅東華的父親是塾師，家境並不富裕，⁷ 12歲上，傅父過世，隔年兄長患傷寒不治，瞻下寡母弱妹，家徒四壁；高中畢業後，傅氏因家貧無法升學，於1912年報考中華書局編譯員。在1910年代，從事翻譯不失為累積資本、提高社會地位的捷徑。當年2元可買50斤米，巡警的工資每月8元，譯者的稿酬則達千字2元至6元不等。例如傅氏在中華書局的前輩林紓和包天笑，林氏千字5-6元，包氏千字3-4元，除了稿費，尚可領取版稅，林紓更因翻譯聲名大噪受聘於北京正志學校，⁸ 傅氏便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踏上翻譯一途。

傅氏在中華書局期間，主要替《中華小說界》翻譯文章，該雜誌於1916年停刊後，傅氏離開中華書局。由於時局動蕩，各家稿酬下滑，

⁷ 傅東華在〈父親的新年〉一文中描述父親在世時家中已年關難過：「一到臘月初頭，父親的面容就變嚴肅了；帳目要清理，年事要備辦，一切都得父親獨個人擔當。有時候，父親緊皺著眉頭，雙手互籠在袖筒裡，默不作聲地在房裡整日的往來踱著，我們都知道他正過著難關。」引自《山胡桃集》，頁74。

⁸ 關於當時的稿酬制度，詳見李秀萍（2010），頁48-72。

例如《新青年》便於1918年取消稿酬，或許因為如此，傅氏離開中華書局後，先後在浙江省立東陽中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人民大學擔任英語教師，整整五年不見新譯問世。然而，自1920年起，北洋政府開始拖欠公職人員薪資，教育部與學校首當其衝，隔年傅氏重拾譯筆，在北京加入「文學研究會」，於其機關刊物《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⁹上發表譯作。此時期稿酬微薄，遠不如1910年。以《小說月報》為例，1910年8月商務印書館創立時，刊例明定稿酬標準：「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兩元」；但自1921年起，《小說月報》不再明列稿費，僅於「本社投稿簡章」註明：「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報」。¹⁰至於《文學週報》的稿酬則時有時無，縱使有也不豐厚。

1924年，「文學研究會」陣地轉移至上海，傅氏隨之赴滬至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月工資不超過50元，但經理人員平均月薪卻高達300元（李秀萍，2010，頁66-67）。由於稿酬不豐，傅氏自1924年到任至1937年商務印書館遷至湖南長沙為止，14年間常於館外兼職翻譯，合作出版社包括世界書局、華通書局、北新書局、新中國書局、新生命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中華書局，並在上海大學、中國大學、武昌中山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等校任職。縱使如此，傅氏的經濟資本仍屬有限。例如傅氏1930年翻譯《失樂園》，稿酬同林紓當年，每千字6元。然而，1916—1936年國民收入年增率為1.45%（張燕萍，2008，頁28），千字6元在1930年代稱不上優渥，傅氏自嘲當年想賣文發跡的夢想是「此路不通」（傅東華，1935a，頁360），而1935年傅氏長子傅

⁹ 《文學週報》前身是《文學旬刊》，1921年5月10日問世，為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1923年7月30日改名為《文學》週刊，1925年5月10日改名為《文學週報》，脫離《時事新報》獨立發行，先後由開明書店、遠東圖書公司印行，1929年12月22日出版第380期後，因為遠東圖書公司關門而停刊。

¹⁰ 引自1923年《小說月報》第14卷第4期。

養浩患傷寒¹¹ 住院，傅養浩晚年回憶：「父親那次在醫院裡整整陪了我四十天，護理之餘，他抓緊時間，翻譯好一部小說，把稿子賣給了中華書局，得了四百元稿費，恰好償付了醫院的費用。那時，我們家中是並不富裕的。」（徐鑄成，2009，頁302）

像傅氏這樣無甚經濟資本的譯者，其對翻譯的選擇，必有別於經濟資本雄厚的譯者，後者多曾出國留學接觸域外文壇，並有資金自辦書局或出版物。然而傅氏對原著的選擇泰半為二手，一則透過贊助人，二則透過出版機制。先談贊助人。傅氏1912-1916年在中華書局任編譯員期間，贊助人不僅決定了「翻什麼」，還決定了「怎麼翻」。根據傅氏回憶，當時是「一位留學生從*Short Magazine* 一類的東西選了幾篇，交我現成翻譯，翻好了當然還是原料，需經過另一文藝製造家去製成商品，這才從中華小說界上去行銷。」（傅東華，1935a，頁361）1921年，傅氏加入「文學研究會」，至1931年「文學研究會」解散為止，期間傅氏的翻譯選材多受贊助人左右，譬如配合《小說月報》「拜倫百年紀念專號」翻譯詩劇《曼弗雷特》(*Manfred*) 和詩歌〈致某婦〉("To a lady")，又配合「安徒生號」翻譯〈幸運的套鞋〉。此外，傅氏曾替「文學研究會叢書」譯介西方文學理論，包括培理 (Bliss Perry) 《詩之研究》(*A Study of Poetry*)、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詩學》(*Ars Poetica*)、蒲克 (Gertrude Buck) 《社會的文學批評論》(*Soci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等，阿英（2003，頁193）稱之為「文學理論及作品譯者」，其實是該叢書總編鄭振鐸側重譯介文學原理與文學批評的緣故。

傅氏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譯員期間，選材皆由主編決定，再找合適的譯者發譯。譬如在譯《失樂園》之前，傅氏從未看過此書，也不曾起過翻譯的念頭：「當萬有文庫的主編者把《失樂園》和我的名字刊入目錄的時候，我還夢想不到會譯《失樂園》。」當時他是「讀完一卷譯一

¹¹ 詳見傅東華（1936b）。

卷的，不，寧說是讀完一節譯一節的」（傅東華，1933b，頁684）。至於翻譯《飄》，則是因為1940年電影在上海紅極一時，傅氏對此事一無所知，係在友人慫恿之下才重拾譯筆，¹²並因此結識美國在華陸軍隨軍參謀楊帝澤上尉 (Captain Jack T. Young)：

去年冬初，楊君以使命秘密來滬，知予嘗譯《飄》，辱駕見訪，把晤甚歡。旋即返滇服務，不通音問者幾一年。太平洋戰爭勝利後，君隨魏德邁將軍返美述職，以十月中重飛滬，一下機即蒙惠臨，以美國新出名說部數種見贈，旋復出示此編之原本，曰：「此世界歷史之一重要文件也，曷譯之？」（傅東華，1946，譯序）

文中楊君委託傅氏翻譯者，即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著作《歐洲與太平洋戰爭之勝利》，其餘「美國新出名說部」，由原作與傅譯出版時間推估，應為《業障》(*My Son, My Son*)、《虎魄》(*Forever Amber*)、《慈母淚》(*Mothers Cry*) 和《天下太平》(*Some Time Never: A Fable for Supermen*)。

由此可知，傅氏對原著的選擇全為二手，或由贊助人委託、或由友人推薦，此外則是受出版機制左右。例如，傅氏在《參情夢》(*The Pierrot of the Minute*)〈譯者的話〉中提到：「我們能覓讀到哪幾種書，差不多一半權柄操在幾家經售西文圖書的書賈手裡，他愛給什麼書你讀，你就只得讀那幾種書。」（傅東華，1925b，頁1）若從中讀到好書，「覺得這種好處不能個人獨享，也得叫那些不懂外國文的人大家享，於是乎偶然把它翻譯出來了。」（頁1）至於如何判斷書籍好壞，則多半以域外評論家的評論為準，以傅氏翻譯《參情夢》始末為例：

自從前年「近代叢書」初到中國，陶孫的詩文集便也在內，後來

¹² 1937年，商務印書館遷址，傅氏留在上海繼續替商務翻譯《吉訶德先生傳》，1939年譯畢，爾後倦於譯事，宣稱就此封筆。詳見傅東華（2008），頁1。

我偶然買了一本，同時又看見一個日本人做的《近代英文學講話》上把陶孫的名字和夏芝諸人並列，又稱他為英國近代戀愛詩人的代表，這纔把他的生平略略考了一下，又把他的集子細讀一過，看見內中有歌劇一篇，覺得中國從不曾有這種體裁的翻譯，於是便著手來嘗試。（傅東華，1925b，頁2）

易言之，若非日本書評家將陶孫的地位與濟慈並列，傅氏很可能不會細讀其作，也不會考察其生平，提筆翻譯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因此，作為經濟資本薄弱的譯者，傅氏對原著的選擇全為二手，或由贊助人委託、或由友人推薦，即便是自發提筆翻譯，手邊可選擇的譯材也由出版機制篩選。因此，文革批鬥時說傅氏自覺利用《飄》來散布資本主義的毒素，實在不公。

叁、譯者養成與翻譯策略

綜上所述，譯者出身限制了傅氏的譯作選擇，底下則要談譯者養成如何影響傅氏的翻譯策略。傅氏的父親是塾師，幼時上的是私塾，受的是傳統教育，逢年過節家中尚有「試筆」的習俗（傅東華，1935b，頁67-69）；就讀上海南洋公學時，又受到辜鴻銘中國本位的思想影響，當年辜先生在西洋史上的一席話，傅氏二十年後仍然記得：

他說我們讀西洋史，應該拿我們自己做本位，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外國人是夷狄，中國人如果不拿自己做本位，難免要化為夷狄。第一天上課，他就把這意思反覆申說，但還怕我們不懂，所以把望遠鏡的掉頭來作譬喻，從此他就差不多要把他那具望遠鏡演習一回，必等我們都說過「懂得」才肯開始講書。（傅東華，1935c，頁57）

這種中國本位的思想成為傅氏的認知基礎，以此來認識域外文藝，反映

在翻譯策略上便是歸化譯法。傅氏初接觸翻譯正值清末民初，歸化譯法盛行，其青年時博覽的《繡像小說》如此譯，後來考入中華書局，局中前輩如林紓和包天笑也是如此譯，歸化譯法因此成為傅氏翻譯散文的慣用方式，例如1913年翻譯的〈斐列賓之工業學校〉，¹³ 譯文依中文語法重新構句：「斐列賓之工業教育，為今日美國教育部最重要最難解決之問題。何則？各處風尚之不同，一也。居民種族之差異，二也。」（頁67）1914年與沈瓶庵合譯的〈白羽冠〉，歸化傾向更為顯著：「雨餘。新霽。闌干外，花香撲人。一丸新月，自樹隙微露，其影，如十五女郎，盈盈微笑。」（頁1）¹⁴

傅氏早年習得的歸化譯法後來從散文衍生至詩歌，在五四文人改以白話譯詩之際，傅氏仍堅持用舊聲調翻譯域外詩歌，希望藉此改良古體詩，開創兼具古詩聲韻節奏和白話詩自由押韻形式的新體韻文。傅氏認為：「中國將來應該有一種新體的韻文，¹⁵ 但若從創作方面著手，總不免要落入舊韻文的窠臼……因此我想當這種新體韻文未確立根基之先，應該多翻譯外國的韻文，以資練習。」（傅東華，1925b，頁2）

為此，傅氏發願以新體韻文翻譯外國長詩一百首（傅東華，1927），包括歌劇《參情夢》：「（探懷出紙卷念介：）『未曾戀愛的，今宵初試；／既曾戀愛的，今宵再試。』／呀，我生平未用情，我

¹³ 刊載於《中華教育界》第12期，署名傅凍華。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

¹⁴ 刊載於《中華小說界》第1年第1期，署名凍蘊、瓶庵。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

¹⁵ 此一「新體韻文」的概念，可上溯自1921年傅東華所作的〈中國今後的韻文〉，刊登在《文學》115期上，文中分析七類韻文將來的盛衰，包括詩（包括四言、五言、七言的古體、絕體、律體等）、賦、騷、歌（包含樂府）、曲（包含詞），以韻文作之傳記、牋牘、論贊，以韻文作之碑銘、祭文、哀辭。傅氏認為：未來的詩有韻、無韻各半，歌、曲則全為韻文，其餘四類將減絕或為散文取代。而將來創作歌、詩、曲，應該：（一）除掉一切曲牌及律格上的限制，而為一種字眼無定數，且得依情緒的指使而自由為平仄，自由押韻的韻文；（二）但仍須有聲調；（三）押韻以國語收聲相同為標準。簡而言之，傅東華理想中的新體韻文打破新體詩和舊體詩之間的藩籬，兼具古體詩的聲韻節奏和白話詩自由的押韻方式。

不解情中旨，／我原來下愚——究竟情何似？」¹⁶；民謠〈阿龍索與伊木真〉("Alonzo The Brave And Fair Imogine")：「有個戰士勇無比，／有個處子豔無倫，／情話喁喁藉草地，相看心下各私心。」¹⁷；史詩《奧德賽》：「懿歟繆司！敢煩謳唱，／唱彼希邦名將，勤勞鞅掌，／謀多制足聲名廣。」¹⁸；輓詩〈布衫行〉("The Song of the Shirt")：「工作，工作，復工作！／遠處雄雞啼喔喔！／工作，工作，復工作！／直至星光照進屋」。¹⁹；敘事詩〈烏林侯的女兒〉("Lord Ullin's Daughter")：「惟時驀地暴風號，／水裡妖魔競呼嘯；／天上陰森成怒容，／三人相顧言如槁。」²⁰；〈多啦〉("Dora")：「老農阿倫田舍家，／同住著威廉與多啦。／威廉是老農之子，多啦是阿倫兄女，寄住在他家。／老農時時顧兩小，心想道：『我欲把他們匹配成家』。」²¹至1927年譯詩集《參情夢及其他》出版前，傅氏共計譯詩十一首，押韻模式皆與原詩殊異。例如《奧德賽》譯自威廉·古柏 (William Cowper) 的無韻詩英譯

¹⁶ 原文：(He takes a scroll from his bosom and reads :) /Pierrot. "He loves to-night who never loved before; /Who ever loved, to-night shall love once more." / I never loved! I know not what love is. /I am so ignorant—but what is this?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7)，頁9。

¹⁷ 原文：A Warrior so bold, and a Virgin so bright/ Conversed, as They sat on the green: /They gazed on each other with tender delight.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5c)，頁1。

¹⁸ 傅氏所本的William Cowper英譯文為：Muse make the man thy theme, for shrewdness famed / And genius versatile, who far and wide / A Wand' rer,……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9a)，頁1。

¹⁹ 原文：Work! work! work! /While the cock is crowing aloof! /And work-work-work, /Till the stars shine through the roof! 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9b)，頁433。此詩馬君武、胡適皆譯為〈縫衣歌〉，劉半農譯為〈縫衣曲〉。

²⁰ 原文：By this the storm grew loud apace, /The water-wraith was shrieking; /And in the scowl of heaven each face/Grew dark as they were speaking. 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5a)，頁11。胡適嘗以五言將該詩譯為〈驚濤篇〉，載於《競業旬報》第33期，譯序曰：「篇中大旨蓋譏切今世婚姻制度而作。其詩為記敘體，類吾國〈孔雀東南飛〉諸作。共十四章。譯為五言」。

²¹ 原文：With farmer Allan at the farm abode/William and Dora. William was his son, /And she his niece. He often look'd at them,/And often thought "I'll make them man and wife."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5d)，頁1。

本，傅氏為貫徹其理念，遂自鑄韻腳，將原詩當成「一種試驗的材料，不管原文有韻無韻，我一律用我自己的韻語來翻，故如《奧德賽》，原是儘可用散文翻的，我也可用韻語。」（傅東華，1933b，頁686）

傅氏的「韻語」就是改良過的古體詩，在鼓吹白話新體詩的年代，這種違背潮流的譯法引來撻伐。1926年，杜衡在《纓珞》旬刊²²上對傅譯《參情夢》逐句糾謬，²³而傅氏以彈詞形式逐譯的〈多啦〉，則遭人譏為「糊塗透頂」。²⁴1927年，傅氏在《參情夢及其他》的〈譯序〉表示：「也許我今後不再用這種韻語譯外國詩了。」（頁2）然而，因其贊助人鄭振鐸肯定傅氏以新體韻文逐譯域外詩歌的策略，因此《參情夢》雖然挨批，仍在連載完後出版單行本，並收錄〈多啦〉等譯作，往後亦可見傅氏以新體韻文譯詩的嘗試，例如1930年翻譯魏吉爾 (Virgil) 〈第四牧歌〉 ("Eclogue IV") 和 〈第八牧歌〉 ("Eclogue VIII") 率皆如此，同年翻譯的《失樂園》也是用韻的，因為傅氏認為這是試驗的好材料，而且自覺韻語運用已臻純熟，故「決計繼續原來的試驗」（傅東華，1933b，頁686）。

傅氏以「新體韻文」翻譯域外詩歌，並以歸化譯法翻譯散文，皆是受中國本位的思想影響。在散文翻譯方面，傅氏受社會化機構（中華書局）影響，以歸化譯法逐譯域外小說。在詩歌翻譯方面，傅氏受私塾教育和辜鴻銘影響，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將翻譯當作工具，目的在創造新體韻文。然而，思想是會轉變的。後期傅氏的散文翻譯之所以逐漸歐化，1927年之所以萌生不再用韻文譯詩的念頭，一則是因為外界批評聲浪，二則與其思想轉變有關。

傅氏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受鄭振鐸、²⁵沈雁冰²⁶等左翼文

²² 《纓珞》旬刊（1926年3月17日至4月17日），由當時在震旦大學念書的施哲存、戴望舒、杜衡自費創辦，共計出版四期。

²³ 參考李洪華（2008），頁111。

²⁴ 參考瞿光輝（2010年10月10日）。

人影響，散文翻譯的句式逐漸歐化，1923年的《青鳥》(*L'Oiseau Bleu*) 便略見端倪：「真珠和寶石愈華麗愈好，愈多愈好，但不能使他破壞全部純粹且真摯的和諧氣象。」²⁷ 1925年後，歐化傾向愈趨顯著，例如〈兩個青年的悲劇〉("A Tragedy of Two Ambitions")，譯文常見前飾過長的傾向：「此時從那曾收入遠處喧囂的開著的窗翼傳進近在咫尺的一個人的聲音。」²⁸ 1927年起，文壇進入左翼十年，譯壇以魯迅等左翼文人推行的直譯法當道，傅氏回應此一趨勢，撰文表示不再以中國韻文逐譯域外詩歌，至於其散文翻譯則早已轉為直譯，直至翻譯生涯晚期皆如此，例如1937年翻譯的《猩紅文》，便讓童元方（2009）評為「徹底到『字』的階段」（頁9），後期傅氏甚至批評自己早年的歸化譯法，例如1948年《慈母淚》譯序：「至於譯者不顧原文的風格，硬要把自己素所喜愛及所熟練的風格拿來裝上，那所得的壞結果也是一樣。從前林琴南用桐城古文及有些人用章回濫調翻譯西洋名著，以致原書的情節和人物都全然改觀，便是前車之鑑了。」（頁1）

由上可知，傅氏的翻譯策略始於歸化、終於歐化，唯1940年翻譯的《飄》是特例，全書人名、地名、食物等盡皆中國化，例如Scarlett O'Hara譯為「郝思嘉」（頁1），Atlanta翻成「餓狼陀」（頁1），pie譯作「餃子」（頁560），但若細看譯序，便會發現傅氏並不認同歸化譯法，故而在翻譯方法上「向讀者諸君請求一點自由權」（頁3）。因此，在思想上，傅氏仍以左翼文人鼓吹的直譯法是尚，1950年代大陸批

²⁵ 鄭振鐸認為「中國的舊文體太陳舊而且成濫調了。有許多很好的思想與情緒都為舊文體的成式所拘，不能盡量的精微的達出……所以為求文學藝術的精進起見，我亟贊成語體文的歐化。」引自鄭振鐸（1921）。

²⁶ 沈雁冰曾對歐化的語體文下了明確的定義：「我所謂『歐化的語體文法』是指直譯原文句子的文法構造底中國字的西洋句調」引自雁冰（1921年7月10日）。

²⁷ 原文：Pearls and other stones as rich and numerous as may be desired, provided that they do not break the pure and candid harmony of the whole. 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3），頁3。

²⁸ 原文：The open casement which admitted the remoter sounds now brought the voice of some one close at hand. 譯文引自傅東華（譯）（1925e），頁108。

判傅譯《飄》的歸化策略與資本主義掛勾，可謂以管窺豹。1933年梁實秋僅譴責傅氏以歸化策略翻譯《失樂園》，卻不論其策略背後的動機，批評傅譯的用字，卻未考察傅氏根據的源本，其論述恐怕有失周延，值得進一步探究。

肆、譯者地位與翻譯論戰

傅譯《失樂園》是該書首部中譯，傅氏譯出前半部，1930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萬有文庫」，共三冊六卷，1937年合為一冊出版，收入「新中學文庫」，1947年發行第三版行銷臺灣。1949年後，臺灣商務五度再版，在臺流通甚廣。此外，根據張和龍（2013）研究，傅譯《失樂園》亦曾在中國數度再版重印，張氏認為傅譯使用白話韻文翻譯密爾頓的無韻體，「在表達方式上非常『中國化』，因此讀起來朗朗上口」（頁74）；因此，從歷史上來看，「傅東華的《失樂園》中譯本，如同林紓的翻譯小說一樣，儘管未必『忠實』原著，但對促進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頁78）

然而，時人對傅氏以歸化譯法逐譯《失樂園》卻難以苟同。1933年10月，梁實秋率先發難，在《圖書評論》上發表〈傅東華譯的《失樂園》〉，認為傅譯「讀起來很順口，像彈詞，像大鼓書，像蓮花落，但不像密爾頓」（梁實秋，1933a，頁37）。文中梁氏引用密爾頓對詩體的說明，作為抨擊傅氏以韻體譯詩的前提：「本詩係英文英雄詩體，無韻，恰如希臘文之荷馬體，與拉丁文之魏吉爾體。因在好詩之中，韻非必要，抑且不能為真正之飾品，於長詩為尤然，韻乃野蠻時代之創造，藉以烘托無聊之內容或殘缺之節奏而已。」（頁36）²⁹此番論述係密爾頓針對十七世紀英國詩壇的爭論而發，至於該詩中譯時是否也該用無韻

²⁹ 原文為：The measure is English heroic verse without rhyme, as that of Homer in Greek and of Virgil in Latin; rhyme being no necessary adjunct or true ornament of poem or good verse, in longer works especially, but that the invention of a barbarous age, to set off wretched matter and lame meter;...

體，論者應另闢論述，但梁氏僅於引文後盛讚密爾頓寫作技巧高超，接續便提倡以無韻體逐譯《失樂園》，目的在於「試驗本國的文字是否能創為一種新的詩體」（頁37），這點和傅氏以韻體譯詩的初衷實則不謀而合。下文梁氏說：「近見徐志摩、孫大雨所譯莎士比亞的斷片，即是以中文寫成無韻詩的嘗試，成功雖不必，其嘗試是可貴的。」（頁37）而傅氏以韻體譯無韻詩的嘗試，梁氏的評論卻是：「傅先生的彈詞式譯文，我覺得好像把原文的神氣改變得太凶了一點。」（頁37）至於徐、孫二人以無韻詩逐譯莎士比亞何以較能保留原文的神韻，梁氏未加闡述，而翻譯密爾頓和翻譯莎士比亞是否能相提並論，亦有待商榷。

在提出傅譯《失樂園》的詩體問題後，梁文臚列傅譯一、二兩卷的九處誤譯，「目的是在借傅先生的譯例來說明密爾頓的文字的艱深與奧妙。」（頁38）例如原文卷一第十五至十六行：“while it pursues / things unattempted yet in prose or rhyme.”，傅譯作：「去追跡一段由情／向未經鋪敘成文，嘔吟成韻。」梁氏指謫pursues譯作「追跡」和原文意思不同，認為密爾頓筆下的pursue應是拉丁文sequor之意，並引侯瑞思 (Horace) 的《詩藝》(*Ars Poetica*) 第二百四十行“ex noto fictum Carmen sequor...”為證，說明此處pursues是「treats of (處置、描寫、敘述……) 之意。」（頁39）此番批評雖有憑有據，但評者和譯者所本的原文卻似不同。傅氏翻譯習慣參考兩種以上的源語文本，例如《吉訶德先生傳》參考了五種英譯本、一種法譯本，³⁰《奧德賽》參考了四種英譯本，³¹ 洛里哀 (Frederic A. Lolicie) 的《比較文學史》則是透過英、日譯本轉譯。³² 至於《失樂園》的源語文本，除了「Everyman Library的白文本」³³ 之外，似可見

³⁰ 英譯本以Charles Jervas的牛津大學版為主，Peter Anthony Motteux的人人叢書版為輔，另外參考Jervas的刪節版、Motteux的近代叢書版和John Ormsby的英譯本，法譯本則參考Ch. Furne的版本。詳見傅東華（1939）。

³¹ 四種英譯本中，一是William Cowper的無韻詩英譯本，二是Alexander Pope的韻文譯本，三是S. H. Butcher和A. Lang的散文譯本，最後則是G. H. Palmer的散文譯本。參考傅東華（1929），頁26。

³² 參考傅東華（1935d），頁162。

帆足理一郎《ミルトン失樂園》³⁴的形跡。上述pursue譯作「追跡」，便是直接挪用日文漢字，再如“though darkness there might well / seem twilight here”，³⁵傅譯「唯是其間的黑暗，不過似下界的黃昏」，彷彿脫胎自日譯文：「けれど天上の暗は下界の黃昏／くらゐのものに過ぎない」；再如“Such as in highest heav'n, arrayed in gold / Empyreal”³⁶；傅譯「有如天之最高頂，裝飾著清火的黃金」，亦參考了日譯本的用詞：「今や天頂におけるが如く／純清の金色を装ういたる。」

針對梁氏的匡謬，傅氏隨即在《文學》上以〈關於失樂園的譯本——答梁實秋的批評〉作為回應。關於詩體問題，傅氏說明之所以打破原文格律而自鑄韻腳，原因有三：純用抑揚格作中文詩，閱讀效果不佳，此其一。³⁷用一種文字去模仿另一種文字的音節，一來成果不彰，二來不切實際，此其二；³⁸以韻體譯詩是為了改良中國古體詩和供讀者消遣，而不是為了模倣密爾頓的詩體，翻譯目的與梁氏不同，此其三。³⁹

³³ 詳見傅東華（1933b）。

³⁴ 帆足理一郎的譯本分上下兩卷，上卷是原文卷一至卷五，1924年出版，下卷是原文卷六至卷十二，1927年出版。第一卷曾於《新人》雜誌上發表。

³⁵ 引自原文卷六第11-12行。

³⁶ 引自原文卷六第13-14行。

³⁷ 傅氏在文中寫道：「英語中的抑揚，例由一個非重音和一個重音錯綜構成，這在國語，就應該是一平一仄的相間，因為國語音節構成的要素只不外是平仄而已。那末若果要用國語嚴格模倣起Blank Verse來，勢非每行都如鐘擺的音節一般，一路『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下去不可。試問有誰能把這種音節的詩連讀五十行而不被催眠的。」引自傅東華（1933b）。

³⁸ 傅氏以孫大雨翻譯的莎士比亞為例，說「他的音節也許很像Blank Verse，也許很像莎士比亞，只是不像中國文，尤其不像中國話……而且Blank Verse所應有的『規律』在哪裡呢？」至於其他文人仿效外文詩歌的作法，傅氏認為亦不可取：「你就看看近幾年來各種試驗的成績罷！上下新齊的方塊頭詩也有了，十四行詩也有了，但是曾有幾首詩是讀得上口的？」他舉出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等人的新詩做得好，是因為這些「大約懂得音節的人……拿比較自然的音節灌在比較解放的形式裡。」此外，這些新詩頂多只能稱為「自由詩」，而不是無韻詩，所以，用中文去模倣英文的無韻詩，「豈非是痴人的妄想？若不是妄想，那便是批評家用以抨擊別人的一種便利的藉口。」引自傅東華（1933b）。

至於梁氏指謫的九條錯處，傅氏逐條答覆，承認誤譯處一條，不妥處一條，其餘七條，梁氏誤解兩條，硬解兩條，另兩條有意炫博，一條敷衍了事。隔月梁氏於《圖書評論》以「來函」形式分就詩體和用字問題再次辯駁，同月又在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上批評傅東華與金兆梓合譯的《詩之研究》，隔了半年又發表〈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再三對傅譯糾謬。

梁、傅的翻譯論戰正值譯壇論爭頻仍之際，其時最為人知者，莫過於1929年末至1930年初魯迅和梁實秋的「信順之爭」。關於魯梁之戰，王宏志的看法頗有見地，指出梁魯之爭看似論戰翻譯標準，其核心卻是政治議題，當中涉及到文學的階級性、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等，不啻為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爭鬥（王宏志，1999）。傅東華和梁實秋雖也是一左一右，但兩人的論戰僅止於詩體及用字問題，故不能單從政治的角度來解讀其轆轤。然則，倘若將譯壇視為地位鬥爭的場所，便會發現權力爭鬥亦涉入其中。

清末以前，中國久居漢語文化中心，譯事多由外國人主筆，知識分子對於翻譯多半不重視。清末科舉廢除，林紓、嚴復等文人因翻譯轉型為新知識分子，翻譯遂成為文人關心的對象，從而進入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階段，掀起一波域外文學翻譯高潮，期間各家對於譯什麼、如何譯，眾說紛紜。翻譯即詮釋。清末民初翻譯處於邊陲地位，詮釋域外文學的權威無人獨占，不諳外語亦可掛名翻譯；隨著翻譯的地位逐漸向中心移動，留學歸國的文人紛紛投身譯壇，與傳統文人展開論戰，從而鞏固學術權力和詮釋特權，改變了譯壇各家的地位高低。

³⁹ 傅氏表示：「只要我的韻語能夠達出如《失樂園》那樣難為的意思，而與原文不至相差十分遠，只要教中國人讀起來覺得『有趣』，覺得『順口』，覺得如彈詞、大鼓書、蓮花落一般容易讀，我的目的就算已經達到。此外我本沒有野心要去『學樣』密爾頓，因為我根本不承認這種所謂『學樣』的可能性，而梁先生偏要拿這一點來責備我，那就等於向空中放箭了。」引自傅東華（1933b）。

1918年4月，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威克列夫翻譯《聖經》為例，論證白話文翻譯對國語形成的重要性，藉此攻訐林紓以古文翻譯的作法：「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論。」（頁305）同年11月，羅家倫（1918）以筆名志希於《新潮》發表〈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暗貶林紓不諳外文，⁴⁰並節譯美國駐中國公使芮恩施 (Paul Samuel Reinsch) 《遠東學思和政治思潮》(*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一書來批評林紓：「美國芮恩施博士抱定『責備賢者』之義，對於林先生稍有微辭。」⁴¹羅氏「節譯」芮恩施對林紓的「微辭」，指謫林譯不論是對原文的選擇還是翻譯的文體，都無法傳達出西洋文學真正的價值。但原文中芮恩施卻是讚賞林紓對譯介西方名著有功：

Credit is also due Sin[sic] Chin-nan, a fellow provincial of Yen Fu, for his admirable rendering into Chinese of the novels of Scott, Dickens, Dumas, Hugo, and other Western writers. (Reinsch, 1911, p. 158)

嚴復同鄉林琴南將司各特、狄更斯、大仲馬、雨果等西方作家的
小說譯成中文，譯筆令人讚賞，亦是有功。⁴²

⁴⁰ 此處原文為：「中國人譯外國小說的，首推林琴南先生。林先生是我們前輩，我不便攻擊他。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認他不懂西文，往往上當，並且勸別人學西文，免蹈他的覆轍，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願意攻擊他。」引自志希（1918），頁108。

⁴¹ 羅家倫於文中註釋註明原文出處：「見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一篇。自一百五十七頁至一百六十五頁」，並將這九頁的英文濃縮成短短一段：「中國人中有一位嚴復的同鄉，叫做林琴南，他譯了許多西洋的小說，如Scott, Dumas, Hugo諸人的著作卻是最多的。中國雖自維新以來，對於文學一項，尚無確實有效的新動機，新標準。舊文學的遺傳絲毫沒有打破，故新文學的潮流也無從發生。現在西洋文學在中國雖然很有勢力，但是觀察中國人所翻譯的西洋小說，中國人還沒有領略西洋文學的真價值呢。中國近來一班文人所譯的都是Harriet Beecher Stowe, Rider Haggard, Hugo, Scott, Bulwer Lytton, Conan Doyle, Jules Verne, Gaboriau, 諸人的小說。多半是冒險的故事及『荒誕主義』的矯揉造作的作品。」

⁴² 中文為筆者自譯。

羅家倫假藉西方學者之口批評新文化運動前一代翻譯名家，胡適高舉西方大轟攻訐傳統士子，皆可見新文人意圖以西方學術為主要依靠，與舊文人在譯壇一較地位高下。

新文化運動後，王友貴（2004）依其意識型態，將新文化運動後第一、二代翻譯家分為四種：弱國模式、西化模式、名士模式、通俗文學模式。弱國模式以轉譯方式譯介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魯迅、茅盾、傅東華等是；西化模式則以留學歐美的知識份子為主，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是。雙方為了在譯壇取得學術權力與詮釋特權，曾展開多場筆戰。傅東華和梁實秋圍繞著《失樂園》展開的翻譯論爭，看似純就詩體和遣詞用字論辯，但若置於歷史脈絡下細察，卻是兩個群體在翻譯領域的鬥爭。刊載梁文的《圖書評論》創刊於1932年9月，是當時唯一的批評性雜誌，魯迅1933年在〈大家降一級試試看〉上稱其為「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⁴³ 時常匡謬譯著，包括糾舉誤譯、批判選材，試圖樹立一套客觀標準和翻譯選目機制，例如羅家倫（1932）在創刊號發表的〈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便批評兩種劣譯：「一種是譯者根本不知道外國標準的書籍，反而把外國不值一錢的東西，向中國亂介紹……又有一種是譯者自己的外國文太壞，望文生義，信筆直書。」（頁2）因此，羅氏於文末提議：「徵集中外學者意見，按照學科門類，訂定標準書籍，列表公布，予有志研究者以正當的路徑」，並且「由國家或負責文化機關，以不謀利的動機，來編譯標準書籍。」（頁6）

刊載傅文的《文學》於1933年7月創刊，編輯傅東華於創刊號發表〈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指出《圖書評論》一到九期發表了25篇「新書鳥瞰」，其中譯評共計12篇，10篇以挑錯為主，除了批

⁴³ 原文以筆名洛文發表於1933年8月15日《申報月刊》第2卷第8期，此處轉引自魯迅（1947），頁131。

評《圖書評論》的譯評方式之外，傅氏亦於文中反對《圖書評論》的編輯和作者群將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奉為文學批評的圭臬，並批評梁實秋〈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⁴⁴的反唯物態度和〈科學時代中之文學心理〉⁴⁵的反科學態度。在這樣的脈絡下，1933年10月《圖書評論》刊出〈傅東華譯的《失樂園》〉，或可視為梁氏對傅氏批評的回應，在其爾雅的文字底下，進行的是譯壇的地位爭奪。其題雖為〈傅東華譯的《失樂園》〉，內容卻未介紹譯者及其翻譯目的、翻譯對象、翻譯策略，反而花了大半篇幅在介紹原作並對傅譯糾謬，其論述邏輯為：《失樂園》是名家名作，所以很艱深，因為很艱深，所以很難譯，故「借傅先生的譯例來說明密爾頓的文字的艱深與奧妙」。同月傅氏在《文學》發表〈關於失樂園的翻譯——答梁實秋的批評〉，除了就梁氏的批評加以辯駁，並再次對《圖書評論》的譯評方式表示不滿：

須知梁某的批評並不是為他自己個人說話，乃是為他的一群說話。那就是一個向來壟斷著文化的教授、學者、專家們之群，這個群為謀自己的地位的安全起見，向來都有一種護身的壁壘，即如莎士比亞、密爾頓一流的所謂「不朽的名著」，便是他們的壁壘之一……他們為鞏固自己的壁壘，就須竭力提高那些名著的尊嚴，因而總把它們說得怎樣怎樣的艱深，怎樣怎樣的奧妙……（傅東華，1933b，頁692）

因此，傅氏疾呼：「如期大家不願意這個教授、學者、專家之群長此壟斷著我們的文化，那麼大家起來罷！」（頁693）

針對傅氏的回文，梁氏旋即於11月《圖書評論》以〈梁實秋先生

⁴⁴ 載於1933年《圖書評論》第1卷第5期。

⁴⁵ 載於1933年《圖書評論》第1卷第8期。

來函〉繼續剖析傅譯《失樂園》之失，並頻頻諷刺傅氏：⁴⁶「足下的文字，若是和學者的作品比較起來，僅僅是一片瘋言」，「老實說，以中學的文法去衡量密爾頓的詩，是有時要碰壁的。」（梁實秋，1933b，頁125）11月25日，梁氏以筆名「定之」在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批評傅東華與金兆梓合譯的《詩之研究》，文中舉了兩處誤譯，以此批評譯者缺乏文學常識：「其他可商榷的地方不必說，單舉這兩例就夠了，夠證明是誰缺乏常識。」（梁實秋，2002，頁166）而隔年刊出的〈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梁氏除了匡謬正訛，亦質疑翻譯此書的價值。梁氏一則不認同原著者琉威松 (Ludwig Lewisohn) 「站在反對人文主義的地位」（梁實秋，1934，頁61），二則不滿意其編選內容多為印象主義之作：「我認為中國現在所最不需要的就是印象主義」（頁62），因為印象主義的「主要原理即推翻理性的判斷力，否認標準的存在」（頁62），故而質疑該書「譯成中文之後有什麼意義」（頁62），論述中帶有鞏固學界批評權威的意味：

此書所輯各篇，在大致上有一共同色彩，似乎是要把批評從『權威』中解放出來，而這『權威』似乎是由學院派的批評家或教授們所支持的。此種解放的精神，在中國現代幼稚的文學界中，是否如傅先生所言，為『當今之急務』，頗是一個疑問。（梁實秋，1934，頁62）

⁴⁶ 傅東華非正規教育出身，幼時受家塾教育，不曾上過小學，教育程度僅高中畢業，學歷遠遠不如梁實秋，二人地位高下立見。

伍、結論

一般論者談及梁實秋與傅東華的《失樂園》論爭，多半從梁氏就傅譯的用字和詩體析疑匡謬為始。關於用字問題，梁傅二人參照的源語文本並不相同。除了密爾頓 (John Milton) 的原文，梁氏參考了畢欽 (Henry Beeching)、錢伯斯 (E. K. Chambers)、司昆爵 (J. C. Scrimgeour) 的註解本，並引拉丁字根、考據詞源、⁴⁷ 求證修辭學⁴⁸ 來闡釋《失樂園》；傅氏參考的則是帆足里一郎的日譯本，故而間接參照了日譯者所本的韋若帝 (A. W. Verity) 的註解本。兩人參考版本不同，闡釋結果難免有出入。至於詩體問題，儘管一人主張用韻、一人主張不用韻，但對於以翻譯開創新體韻文的看法則一。因此，兩人之所以爆發激烈筆戰，原因恐怕還在文本之外。

從地位鬥爭的觀點來看，梁、傅的《失樂園》論戰自有其歷史脈絡。自從科舉制度廢除後，大批文人投入譯壇，先是新舊抗衡，後則左右相敵，爭的是對域外文學的譯介權和詮釋權，也就是譯什麼？怎麼譯？誰來譯？的問題。梁、傅二人之所以爆發論戰，導火線在於傅氏先以〈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一文，抨擊梁實秋等右派文人在《圖書評論》上藉掀謬鞏固權威、壟斷對域外文學的詮釋權。是故這場論戰表面上是詩體和用字的論爭，實際上卻是雙方在翻譯場上較勁，目的在於取得該領域的學術權力與知識特權。傅氏的出身及學養遠不及梁氏，兩人地位落差極大，傅氏可謂未戰先敗，此後便轉以白話文譯詩。與此同時，梁氏以無韻體逐譯《失樂園》的論調漸成主流，例如朱維

⁴⁷ 梁氏考據「原文admiral字源出阿拉伯文」，批評傅氏譯為「船主」為誤譯。詳見梁實秋（1933a），頁40。

⁴⁸ 梁氏批評傅譯卷二第65至8行誤譯時，即輔以修辭學為之說明：「密爾頓常常喜歡把一個抽象名詞和一個具體名詞聯在一起，中間綴以“and”字樣，這在修辭學中叫做hendiadys」。詳見梁實秋（1933a），頁41。

基（1933）⁴⁹〈談彌爾敦失樂園的翻譯〉，亦抨擊「傅先生用的是陳舊的、庸俗的、彈詞般的『韻語』」。論戰過後十年，朱自清（1947）提及傅譯《失樂園》時雖讚其「流利便讀，明白易曉」（頁117），但仍反對以韻文逐譯的策略：「《失樂園》本就是無韻體，彌爾頓又是反對押韻的人，似乎更宜用無韻體去譯。」（頁117）兩岸分治後，梁氏成為臺灣譯壇祭酒，其不得以韻文譯無韻詩的論調，便在大量複製生產後蔚為知識主流。

知識和知識的權威都是社會的建構，1930年代的《失樂園》之爭如此，1950年代對《飄》的批判也是如此。當時大陸學界一則抨擊傅氏自覺用《飄》來宣揚資本主義，二則批判其歸化策略帶有資本主義色彩，討論的也是譯什麼和怎麼譯的問題。傅氏作為無甚資本的譯者，對原著的選擇全為二手，如何自覺利用《飄》來散布資本主義毒素？而《飄》雖採用歸化策略，然從其譯序可知，傅氏當時的翻譯觀仍以直譯為上，並未「帶有反動的翻譯觀」。以上兩個案例，均突顯單做譯本研究的侷限。

只評譯作不評譯者，等於除去譯作所處的歷史脈絡，這種去脈絡化的研究對譯者並不公平。傅氏的譯者身分在臺灣遭到隱匿，儘管其譯作共有17部在臺流傳，譯者研究卻乏人問津，導致研究者對其譯作多有曲解。因此，本文從譯者研究切入，讓譯者重返歷史舞臺，由此發現從譯什麼到怎麼譯，從文言譯述到白話翻譯，從歸化策略到異化策略，都可見譯者出身、譯者養成、譯者地位三者交互運作在其中。

⁴⁹ 朱維基（1904-1971），上海人，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善譯長詩，包括但丁《神曲》和拜倫《唐璜》，亦譯有《失樂園》，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王友貴（2004）。意識型態與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史。譯學英華：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獎1999—2004文集，第一卷（頁160-17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 王宏志（1999）。翻譯與階級鬥爭——論1929年魯迅與梁實秋的論爭。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頁240-272）。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 朱自清（1947）。譯詩。新詩雜話（頁104-117）。上海：作家書屋。
- 朱維基（1933）。談彌爾敦失樂園的翻譯。十月談，11。
- 志希（1918）。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1(1)，頁106-116。
- 李秀萍（2010）。文學研究會與中國現代文學制度（頁48-72）。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李洪華（2008）。上海文化與現代派文學（頁111）。臺北：秀威資訊。
- 吳慧敏（2007）。《飄》在中國重寫的歷史反思。文教資料，31，19-22。
- 阿英（編）（2003）。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史料·索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林玉珍（2009）。國際化、本土化、第三空間：國內二十世紀愛爾蘭文學研究。取自http://www.hrc.ntu.edu.tw/attachments/projects_07.pdf
- 金性堯（2008）。傅東華的山胡桃集。星屋雜憶（頁134-136）。上海：上海辭書。
- 胡適（1918）。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4(4)，289-306。
- 振鐸（1921年）。語體文歐化之我觀（二）。小說月報，12(6)。
- 凍蘄、瓶庵（譯）（1914）。白羽冠。中華小說界，1(1)，1-4。

- 徐鑄成（2009）。傅東華——一個被遺忘的人。舊聞雜憶修訂版（頁298-3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孫致禮（1996）。1949-1966：中國英美文學翻譯概論。南京：譯林。
- 陳祖文（1971）。英詩中譯——何以要忠實於原作的結構。譯詩的理論與實踐（頁28-44）。臺北：環宇出版社。
- 張和龍（2013）。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角力——關於傅東華《失樂園》首譯本的翻譯論爭。東方翻譯，1，74-78。
- 張家平（1995）。一部毀譽參半的暢銷書——美國小說《飄》研究評述。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8(1)，72-77。
- 張燕萍（2008）。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經濟動員研究（頁28）。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雁冰（1921年7月10日）。《語體文歐化》答凍蔭君。時事新報，文學旬刊，7。
- 梁實秋（1933a）。傅東華譯的失樂園。圖書評論，2(2)，35-42。
- 梁實秋（1933b）。梁實秋先生來函。圖書評論，2(4)，123-126。
- 梁實秋（1934）。傅東華譯《近世文學批評》。圖書評論，2(9)，61-66。
- 梁實秋（2002）。詩之研究。載於陳子善（編），雅舍談書（頁165-166）。臺北：九歌。
- 童元方（2009）。丹青難寫是精神——論梁實秋譯《咆哮山莊》與傅東華譯《紅字》。選擇與創造：文學翻譯論叢（頁1-1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傅凍華（譯）（1913）。斐列賓之工業學校。中華教育界，12，67-70。
- 傅東華（譯）（1923）。青鳥。上海：商務印書館。
- 傅東華（譯）（1925a）。烏林侯的女兒。小說月報，16(6)，10-12。
- 傅東華（譯）（1925b）。《參情夢》譯者的話。小說月報，16(10)，1-8。

- 傅東華（譯）（1925c）。阿龍索與伊木真。小說月報，16(11)，1-4。
- 傅東華（譯）（1925d）。多啦。小說月報，16(12)，1-6。
- 傅東華（譯）（1925e）。兩個青年的悲劇。東方雜誌，22(5)，108-127。
- 傅東華（譯）（1927）。參情夢及其他。上海：開明。
- 傅東華（譯）（1929a）。奧德賽。上海：商務。
- 傅東華（譯）（1929b）。布衫行。文學週報，5，頁433-435。
- 傅東華（1933a）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文學，1(1)，頁54-59。
- 傅東華（1933b）關於《失樂園》的翻譯——答梁實秋的批評。文學，1(5)，頁684-693。
- 傅東華（1935a）。此路不通。山胡桃集（頁359-363）。上海：生活書局。
- 傅東華（1935b）。一九三四新年試筆。山胡桃集（頁67-72）。上海：生活書局。
- 傅東華（1935c）。回味。山胡桃集（頁55-65）。上海：生活書局。
- 傅東華（1935d）。「比較文學史」譯序。山胡桃集（頁149-162）。上海：生活書局。
- 傅東華（1936a）。真妮姑娘。新中華，4(7)，85-87。
- 傅東華（1936b）。悼魯迅先生。文學，7(5)，749-751。
- 傅東華（1939）。校讀後記。吉訶德先生傳（頁583-585）。上海：商務印書館。
- 傅東華（譯）（1946）。譯序。歐洲與太平洋戰爭之勝利。上海：龍門聯合。
- 傅東華（譯）（1948）。慈母淚。上海：龍門聯合。
- 傅東華（譯）（2008）。飄。浙江：浙江文藝。
- 魯迅（1947）。大家降一級試試看。載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

南腔北調集（131-133頁）。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

賴慈芸、張思婷（2011）。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劃。

編譯論叢，4(2)，頁151-180。

鄭樹森（2004年3月2日）。「最愛100小說大選」揭曉隨想。聯合報，

E7。

謝天振（2002）。翻譯研究新視野。青島：青島出版社。

韓迪厚（1969）。近代翻譯史話。香港：香港辰衡圖書公司。

羅家倫（1932）。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圖書評論，1(1)，頁

1-6。

瞿光輝（2010年10月10日）。參情夢及其他。溫州晚報，9版。

日文文獻

帆足里一郎（譯）（1927）。ミルトン失樂園（下卷）。東京：新生堂。

英文文獻

Reinsch, P. S. (1911).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附錄：臺灣流通的傅東華譯作一覽表

1. 1926 《詩學》上海：商務
1967 傅東華《詩學》臺北：臺灣商務
2. 1929 《奧德賽》上海：商務
1960 編譯部《奧德賽》臺北：啟明
1966 傅東華《奧德賽》臺北：臺灣商務
1968 李烈文《奧德賽》臺北：正文
1974 佚名《奧德賽》臺中：普天
1978 編輯部《奧德賽》臺北：遠景
1983 佚名《奧德賽》臺南：綜合
1994 編輯部《奧德賽》臺北：書華
3. 1930 《失樂園》上海：商務
1965 傅東華《失樂園》臺北：臺灣商務
4. 1931 《比較文學史》上海：商務
1965 傅東華《比較文學史》臺北：臺灣商務
5. 1933 《我們的世界》上海：生命
1979 佚名《我們的世界》臺北：廣文
6. 1935 《美學原論》上海：商務
1965 傅東華《美學原論》臺北：臺灣商務
7. 1935 《失戀復戀》上海：中華
1971 陳雙鈞《失戀復戀》臺北：正文
1981 編輯部《失戀復戀》臺南：文言
8. 1935 《文學概論》上海：商務
1966 傅東華《文學概論》臺北：臺灣商務
9. 1936 《化外人》上海：商務

- 1967 傅東華《化外人》臺北：臺灣商務
10. 1937《猩紅文》上海：商務
- 1956 凌雲《紅字》臺北：旋風
- 1971 傅東華《猩紅文》臺北：臺灣商務
- 1979 編輯部《紅字》臺北：遠景
- 1980 編輯部《紅字》臺北：喜美
- 1986 編輯部《紅字》臺北：書華
- 1987 編譯部《紅字》臺南：文國
- 1988 編輯部《紅字》臺南：文祥
- 1993 編輯部《紅字》臺北：萬象
- 1994 鍾斯《紅字》臺北：桂冠
- 1996 吳雅惠《紅字》臺南：漢風⁵⁰
- 1997 敖凡《紅字》臺北：建宏
- 1995 佚名《紅字》臺南：祥一
- 1999 鍾斯《紅字》臺北：錦繡
11. 1937傅東華、于熙儉合譯《美國短篇小說集》上海：商務
- 1959 傅東華、于熙儉合譯《美國短篇小說集》臺北：臺灣商務
12. 1939《吉訶德先生傳》上海：商務
- 1957 佚名《唐·吉訶德傳》臺北：文壇⁵¹
- 1960 編譯所《吉訶德先生傳》臺北：啟明
- 1963 傅均《唐吉訶德傳》臺北：文源
- 1968 編輯部《唐·吉訶德》臺北：海燕
- 1974 施品山《唐吉訶德傳》臺南：北一
- 1975 蘇雪茵《唐·吉訶德傳》臺南：臺南東海

⁵⁰ 文字經過潤飾。

⁵¹ 1974年五版。

- 1975 錢仁《唐吉訶德》臺北：地球
1976 甘瑚乾《唐吉訶德傳》臺北：西南
1978 編輯部《唐吉訶德傳》臺北：遠景
1982 施品山《唐吉訶德傳》臺北：大孚
1990 佚名《唐·吉訶德傳》臺南：漢風
1995 佚名《唐吉訶德傳》臺北：文國
1999 鍾文《唐吉訶德》臺北：錦繡
13. 1940《飄》上海：龍門
- 1953 傅東華《飄》臺北：龍門
1957 傅均《飄》臺北：淡江
1975 佚名《飄》臺南：世一
1975 傅昌均《飄》臺北：臺灣時代
1975 佚名《飄》臺南：唯一
1976 佚名《飄》臺南：大行
1977 佚名《飄》臺北：眾文
1977 佚名《飄》臺北：大方
1977 佚名《飄》臺南：利大
1978 佚名《飄》臺南：新世紀
1979 佚名《飄》臺北：遠景
1980 佚名《飄》臺北：世一
1980 佚名《飄》臺北：喜美
1980 佚名《飄》臺北：綜合
1980 佚名《飄》臺南：莊家
1981 佚名《飄》臺北：名家
1982 佚名《飄》臺南：利大
1982 佚名《亂世佳人》臺南：莊家
1982 佚名《亂世佳人》臺南：文言

- 1983 傅東華《飄》臺北：遠景
1984 佚名《飄》臺南：晨光
1985 佚名《飄》臺北：輔新
1985 佚名《飄》臺南：國正
1986 編輯部《飄》臺北：書華
1987 鐘斯《飄》臺北：遠景
1988 佚名《飄》臺北：智揚
1988 佚名《飄》臺南：文國
1989 佚名《飄》臺南：祥一
1991 佚名《飄》臺北：雨田
1991 佚名《飄》臺南：漢風
1991 佚名《飄》臺南：文國⁵²
1992 編輯部《飄》臺南：博元
1992 佚名《飄》臺南：世一
1994 佚名《飄》臺南：大佑
1996 陳美燕《亂世佳人》臺南：文國
1999 傅東華《飄》臺北：錦繡
出版年不詳 佚名《飄》臺南：魯南
14. 1946《業障》上海：龍門
1958 傅均《業障》臺北：大華
15. 1947《虎魄》上海：龍門
1955 顧隱《永恆的虎魄》臺北：新興
1969 胡適宏《永恆的琥珀》臺北：正文
1978 編輯部《琥珀》臺北：遠景

⁵² 1988年的文國版隸屬「世界文學名著」書系，1991年版本改編入「世界文學名著新譯本」書系。

16. 1948 《慈母淚》 河南：龍門
- 1955 顧隱《慈母淚》 臺北：新興
- 1969 何維民《慈母淚》 臺南：臺南東海
- 1969 顧隱《慈母淚》 臺北：正文
- 1971 佚名《慈母淚》 臺南：文良
- 1972 陳慧玲《慈母淚》 臺南：綜合
- 1975 佚名《慈母淚》 高雄：光明
- 1975 佚名《慈母淚》 臺中：普天
- 1976 佚名《慈母淚》 臺北：五福
- 1981 佚名《慈母淚》 臺北：五洲
- 1981 佚名《慈母淚》 高雄：高雄復文
17. 1958 《伊利亞特》 北京：人民文學
- 1982 鄧欣揚《伊利亞德》 臺北：遠景

